学术专论

名与实：格尔必齐河位置之争的起源

杨丽婷　侯杨方

［**摘要**］关于康熙年间中俄《尼布楚条约》议定界河格尔必齐河的位置，学界一直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国内学者一般认为今东经 119°10′，北纬 35°08′的格尔必齐河就是当年的界河，而国外有些学者则认为是其东边的阿玛扎尔河（在清代曾被称为大格尔必齐河）。本文从分析大量的清代有关界河格尔必齐河的舆图和文献资料入手，爬梳两种界河位置观点的资料依据及起源，认为外国传教士负责绘制的《皇舆全览图》错误地把格尔必齐河标注在大格尔必齐河的东边，之后清代编纂的大量舆图、文献甚至西方介绍中国疆域的书籍不加考辨地沿袭传抄，这成为误解界河格尔必齐河位置的资料基础。格尔必齐河位置之争，揭示了清代舆图文献编纂过程中沿袭传抄的弊病，只有不断追溯资料的原始来源，辨别原始资料的正误，才能从根本上还原历史真相。

［**关键词**］尼布楚条约　格尔必齐河　吉林九河图　黑龙江流域图　皇舆全览图
［**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587（2015）－03－0039－08

引言

中俄尼布楚条约拉丁文本第一条规定："以流入黑龙江之绰尔纳河，即鞑靼语所称乌鲁穆河附近之格尔必齐河为两国之界"①，于是，格尔必齐河成为早期中俄东段边界的一条界河而备受关注。但是清代有关黑龙江流域一系列的舆图上，位于黑龙江上游恰好有两条格尔必齐河，大格尔必齐河和格尔必齐河，在清代舆图和文献中有关它们的记载非常混乱，使人们一时无法确定界河格尔必齐河的真正位置。十八世纪中叶俄国的史学家米勒声称，尼布楚条约所议定的边界应该是大格尔必齐河，即较为东边的一条，后来因为满洲人"偶然得知还有一条小格尔必齐河，他们就将边界西移至小格尔必齐河了"。②二十世纪以来的众多俄国或一些欧美学者也相信米勒的移界说。

1988 年出版的《〈中国历史地图集〉释文汇编·东北卷》考证，当时的界河格尔必齐河就是今东经 119°10′，北纬 35°8′的格尔必齐河，认为"问题在于格尔必齐河有两条乃至两条以上，乌伦穆河也是如此"③。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学者刘远图在《早期中俄东段边界研究》一书中对

［**收稿日期**］2015－01－20
［**作者简介**］杨丽婷（1989—），女，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上海 200443，12110760001@fudan.edu.cn；侯杨方（1970－），男，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上海 200433，yfhou@fudan.edu.cn

① 刘远图：《早期中俄东段边界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年，附录一。
② 刘远图：《早期中俄东段边界研究》，第 80 页。
③ 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释文汇编·东北卷》，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8 年，第 361 页。

米勒的移界说进行了针对性的批判，指出尼布楚会议上所用地图是《吉林九河图》的原图，图中绘示的格尔必齐河清楚地表明了谈判时界河的位置，即位于西边的格尔必齐河。① 同年，薛虹偶然在破烂摊发现彩绘满文黑龙江地图，经考证认定为道光初年绘制的当时的黑龙江形势图。这幅新发现的黑龙江形势图进一步验证了《吉林九河图》对界河格尔必齐河绘示的正确性。②

2014 年新发表的《格尔必齐河问题新探》，通过《钦定盛京通志》的有发音极为相似的“格呼卜齐河”和“安巴吉尔齐河”的记载，提出一种解释：“由于格尔必齐河与东面的格呼卜齐河被混同，原先在格尔必齐河以西的安巴格尔必齐河之名就相应地向东移动到了原先的格尔必齐河的位置上。因此，《皇舆全览图》、《龙沙纪略》和《乾隆大清一统志》都受到了这个错误的影响，将安巴格尔必齐河作为界河，以东为卓罗克齐河，又东为格尔必齐河即格呼卜齐河。”③ 对于这一解释笔者不能赞同，将在下文中考辨《钦定盛京通志》中对“格呼卜齐河”和“安巴吉尔齐河”的记载的可靠性。

一、舆图、典籍中记载的混乱

为探清这两种格尔必齐河位置观点的资料依据，我们将清代文献中有关格尔必齐河的记载进行系统的整理。按时间先后顺序，将清代相关舆图和典籍中对格尔必齐河及附近其它黑龙江支流的标注、记载，从西至东编制成表 1 和表 2 如下。

表 1　各图格尔必齐河及附近河流名称对照

图名	河流名／成图年								
吉林九河图	康熙二十一年（1682）－康熙三十年（1691）	corna bira	gerbici bira	jolokci bira		amba gerbici bira			
黑龙江流域图	康熙二十九年（1690）－四十九年（1710）间		gerbici bira，bei	jolokci bira		amba gerbici bira	or bira	oldokon bira	
皇舆全览图(满文本)	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		amba gerbici bira	jolokci bira		gerbici bira	or bira	oldokon bira	ursu bira
皇舆全览图(拉丁文本)	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		amba kerbichi	cholocchi		agigue Kerbichi	or	oltokon	Oursou
雍正十排图	雍正七年(1729 年)		amba gerbici bira，bei	jolokci bira		corna sere uruma bira	or bira	oldokon bira	ursu bira
乾隆十排三图	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		安巴格尔毕齐必拉，碑	卓罗克齐必拉		绰尔纳色勒乌鲁穆必拉	鄂尔必拉	鄂尔多昆必拉	乌尔苏必拉
盛京等处标注战绩图	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		amba gerbici bira，大格尔弼齐河，eldengge wehe 碑碣	jolokci bira，卓罗克齐河	uruma bira，乌鲁木河	gerbici bira 格尔弼齐河	or bira 鄂尔河	oldokon bira 鄂勒多宽河	ursu bira 乌尔苏河

① 刘远图：《早期中俄东段边界研究》，第 52—69 页。
② 薛虹：《彩绘满文黑龙江地图和格尔必齐河的位置》，《清史研究》1993 年第 4 期。
③ 周峤：《格尔必齐河问题新探》，《才智》2014 年第 7 期。

图名	河流名 成图年							
钦定大清会典图（嘉庆朝）	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		安巴格尔必齐河	卓鲁克齐河	乌鲁穆河	格尔必齐河	鄂尔河	鄂尔多昆河	乌尔苏河
皇朝一统舆地全图	道光十二年（1832年）		安巴格尔必齐河，界碑	卓鲁克齐河	乌鲁穆河	格尔必齐河	鄂尔河	鄂尔多昆河	乌尔斯河
大清会典图（光绪朝）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		安巴格尔必齐河	卓罗克齐河	绰尔纳色勒乌鲁穆河	格尔必齐河	鄂尔河	鄂尔多昆河	乌尔苏河

表2　各文献格尔必齐河及附近河流名称和记载对照

文献名称	相关记载 成书年代						
《龙沙纪略》	康熙五十五年（1716）前后	阿济格格里必奇，分界碑	卓尔克齐	昂班格里必齐	俄罗	鄂尔多昆	乌里苏
《大清一统志》（蒋版）	乾隆八年（1743）	大格尔必齐河，分界碑，在黑龙江城西北一千七百九十里，分界石碑在河之东	卓洛克齐河，在黑龙江城西北一千七百三十里	格尔必齐河，在城西北一千六百九十里	俄尔河，在城西北一千六百七十里	俄尔多昆河，在城西北一千六百四十里	乌尔苏河，在城西北一千六百三十里
《大清一统志》（和版）	乾隆四十九年（1784）	安巴吉尔巴齐河，分界石碑，在黑龙江成西北一千七百九十里	济噜克齐河，在城西北一千七百三十里	吉尔巴齐河，在城西一千六百九十里	额哩河，在城西北一千六百七十里	鄂尔多库勒河，在城西北一千六百四十里	乌尔苏河，在城西北一千六百三十里
《大清一统志》（穆版）	道光二十二年（1842）	吉尔巴齐河，分界石碑，在黑龙江成西北一千七百三十里	济噜克齐河，在城西北一千七百里	安巴吉尔齐河，在城西一千六百七十里	额哩河，在城西北一千五百七十里	鄂尔多库勒河，在城西北一千五百五十里	乌尔苏河，在城西北一千五百三十里
《水道提纲》	乾隆二十六年（1761）	昂巴奇里比奇河，界碑	卓罗克其河	哥里比奇河	俄勒河	敖儿多荤河	乌里苏河
《钦定盛京通志》黑龙江形势图	乾隆四十四年（1799）	吉尔巴齐河，俄罗斯界碑	济鲁克齐河	安巴吉尔巴齐河	鄂尔河	鄂尔多库尔河	乌尔苏河

由上表可见，较早成图的《吉林九河图》和《黑龙江流域图》都将界河记作格尔必齐河，而从《皇舆全览图》起，以及之后的《雍正十排图》、《乾隆十三图》、《盛京等处标注战绩图》、《钦定大清会典图（嘉庆朝）》、《皇朝一统舆地全图》和《钦定大清会典图（光绪朝）》都将界河记作大格尔必齐河。① 各舆图中对尼布楚条约中提到的另一条河流“乌鲁穆河”或“绰尔纳河”的位置的注记也有很大的差异。《吉林九河图》中的绰尔纳河记作“corna bira”，在尼布楚河以东、格尔必齐河以西的附近位置。《黑龙江流域图》、《皇舆全览图（满文本）》和《皇舆全览图（拉丁文本）》都没有注记绰尔纳河的位置，自《雍正十排图》开始又出现了绰尔纳河，

① gerbici bira 是格尔必齐河的满语名，吉尔巴齐、格尔弼齐都是满文 gerbici 的音译；其后的 amba gerbici bira 是满语大格尔必齐河的意思，昂巴奇里比奇、昂班格里必齐是满文 amba gerbici 的音译。另本文所用满文采用穆麟德转写法。

《雍正十排图》记作 corna sere uruma bira,《乾隆十排三图》记作绰尔纳色勒乌鲁穆必拉,《盛京等处标注战绩图》记作 uruma bira，乌鲁木河，《钦定大清会典图（嘉庆朝)》和《皇朝一统舆地全图》记作乌鲁穆河,《光绪会典图》记作绰尔纳色勒乌鲁穆河；它们注记的位置同样是处于格尔必齐河以西附近，但整体位置已经随格尔必齐河一起东移。在这些众多的清代舆图和文献中，绝大多数只有格尔必齐河和大格尔必齐河，并不存在小格尔必齐河，但是成书于康熙年间的《龙沙纪略》有着小格尔必齐河的记载，“自界碑横而东也，河之由西北而南入江者九，曰阿集格格里必齐[1]，曰卓尔克齐河，曰昂班格里必齐，曰俄罗，曰倭尔多昆，曰乌里苏，曰博伦穆达，曰额尔格，曰必勒罩也。”《皇舆全览图》的拉丁文本与其满文本的绘示也不尽相同，它在满文本所注的格尔必齐河标注为小格尔必齐河（见表 1)。[2] 然而，《皇舆全览图》拉丁文本和《龙沙纪略》所记载的小格尔必齐河位置又不相同，前者绘于界碑东边，《龙沙纪略》记载的大格尔必齐河的位置，而后者绘于界碑旁边，即《皇舆全览图》中绘示的大格尔必齐河的位置。

在表 2 列举的文献资料中，各版本资料对格尔必齐河及其附近几条河流的记载也颇有出入。一方面是河流的译名五花八门，另一方面是记载的道里路程没有定数（如表 2 所示)。其中最典型的大概要数阿桂主持、乾隆四十九年成书的《钦定盛京通志》。《钦定盛京通志》中《黑龙江将军所属形势图》所绘内容与穆版《大清一统志》中的《黑龙江图》十分相似，只是《黑龙江图》中将鄂尔河的河名脱漏。但将《钦定盛京通志》卷二十八黑龙江各属山川的汇编与注解，与前文的《黑龙江将军所属形势图》相对照，可以发现，虽然在同一本书中，二者内容却有多处矛盾。根据卷二十八的注解，吉尔巴齐河，城西北一千九百九十里；济噜克齐河，城西北一千七百三十里；鄂尔河城西北一千五百七十里；鄂尔多库勒河，城西北一千六百四十里；乌尔苏河，城西北一千六百三十里。按这些记载，这些支流自西而东的顺序应该是，吉尔巴齐河、济噜克齐河、鄂尔多库勒河、乌尔苏河和鄂尔河，与同在《钦定盛京通志》中的《黑龙江将军所属形势图》所绘顺序和众多文献记载不符。事实上，尽管众多文献记载的顺序不尽相同，但最常见的顺序是，吉尔巴齐河、济噜克齐河、鄂尔河、鄂尔多库勒河、乌尔苏河。《钦定盛京通志》中同时记载了鄂尔河与额哩河、鄂尔多观河与鄂尔多库勒河，并且认为它们是四条不同的河流。事实上，通过对照其他舆图和文献，我们可以肯定鄂尔河就是额哩河、鄂尔多观河就是鄂尔多库勒河，皆为同一河流的不同译名。对于这些现象，我们可以推导出一个合理的解释,《钦定盛京通志》作为一个大型的资料汇编，大量地参考了《大清一统志》及其他相关典籍资料，有些甚至是照搬全抄。由于各版本资料对同一河流的译名和记载的里数都不一样，编纂者很容易将不同译名的同一条河流误当成两条不同的河流而一齐收录。

不仅如此,《钦定盛京通志》对相应河流名称的解释也多有错误。如，“鄂尔多库勒河，鄂尔多蒙古语详见奉天府山川卷库勒腿也”，而奉天府山川卷中对鄂尔多的解释是“国语‘鄂尔多’‘亭’也”，并非蒙古语。另一个例子是，“鄂勒多观河，蒙古语‘鄂勒’土著也，‘多观’语解见吉林山川卷”，但吉林山川卷并没有对“多观”的解释。“鄂尔多库勒”和“鄂勒多观”都是满文字母写作“oldokon”一词的汉文译名。事实上蒙古语和满语中都没有“oldokon”一词。17 世纪时，这一地带的居民主要是索伦诸部，即现在的达斡尔人或鄂温克人，所以“oldokon”有可能是当地的土语。《钦定盛京通志》在抄了鄂尔多库勒河和鄂尔多观河两个汉文译名后，没有追溯河流的原有名字，也没有追溯这两条河流到底在哪，而是直接将“鄂尔多库勒”拆成“鄂尔多”和“库勒”、“鄂勒多观”拆成“鄂勒”和“多观”进行解释。同样，在众多清代文献中，只有《钦定盛京通志》提到了这条“格呼卜齐河”，并且与另一条“安巴吉尔齐河”的位置竟然重叠，都是“距城西北一千六百七十里。更为奇怪的是它并没有提到书中《黑龙江将

---

① 阿集格为满文 ajige 的音译，“阿集格格里必齐河”应译为小格尔必齐河。

② 《皇舆全览图》拉丁文本所注 agigue Kerbichi 为满文 ajige gerbici 的音译，即小格尔必齐河。

军所属形势图》中标记、且众多文献都提到的“安巴吉尔必齐河”。① 鉴于《钦定盛京通志》对 or bira 和 oldokon bira 记载的混乱和名称解释的错误，我们有理由怀疑“格呼卜齐河”是从其他地方抄来，并没有追溯原文而直接对“格呼卜齐”进行臆断的翻译。“安巴吉尔齐河”也是“安巴吉尔巴齐河”的笔误，同时主观将“吉尔齐”的解释加于其后。因此我们可以断定，“格呼卜齐河”、“安巴吉尔齐河”和“安巴吉尔巴齐河”都是指同一条河流。

二、各图籍的沿袭——争论的起源

通过以上整理，清代典籍对格尔必齐及周围河流记载的混乱程度可见一斑，这成为近现代学界对格尔必齐河位置之争的生存土壤。米勒将注意力集中于刚好在中国文献中产生混乱的河流名称，他关注“格尔必齐河”河名标示的位置，认为这是寻找界河位置的最佳方法；而对于界碑标示在大格尔必齐河旁边这一疑点，他认为是由于清人移动过界碑，满洲人“偶然得知还有一条小格尔必齐河，他们就将边界西移至小格尔必齐河了”②。他是从界碑旁河流名称的变化来判断界碑是否移动的。如果忽略各舆图、文献对格尔必齐河本身的记载，而把目光投向同样标示着边界的界碑，我们会发现界碑从未被移动过。当我们无法通过记载混乱的格尔必齐河确定界河位置时，位置清晰无疑的界碑便成为确定界河位置的最佳参照。从表 1 和表 2 可以看到，无论各典籍标注的边界旁边的河流是大格尔必齐河还是格尔必齐河，界碑的位置是相同的，即靠近西边的那条河（参见图 1）。界碑是为了标示两国分界线而存在，理所当然地，界碑旁边的河流即为界河，即《尼布楚条约》所提到的格尔必齐河。因此，我们可以确定谭其骧等学者指出的东经 119°10′，北纬 35°8′的格尔必齐河才是尼布楚条约规定的界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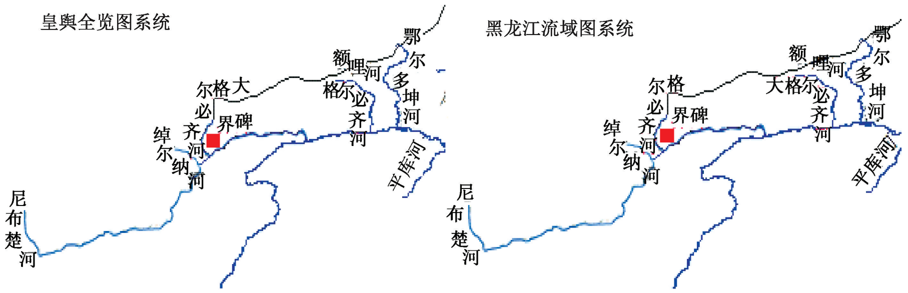

图 1　两系统格尔必齐河与界碑位置

《吉林九河图》的绘示与《尼布楚条约》的描述十分吻合。它绘示的格尔必齐河的位置，在之后的舆图、文献中一直有界碑的存在，并且绰尔纳河在其附近稍西。《吉林九河图》的绘制者郎坦曾在雅克萨战争前进行过军事准备和地理考察，之后作为第三号代表出席尼布楚会议；因此，吉田金一认为《吉林九河图》的原图就是尼布楚会议的谈判用图。

康熙二十九年（1690），黑龙江将军萨布素和宁古塔将军巴海等人分九路首次视察黑龙江流域东北部边界，并在这次视察的边界报告和舆图资料的基础上绘制出《黑龙江流域图》。《黑龙江流域图》对格尔必齐河的绘示与《吉林九河图》一致，且在格尔必齐河左岸加了界碑。承志认为由于当时找不到制作界碑的石材，图上的界碑实际上并不存在，他认为《黑龙江流域图》

① 阿桂等修：《钦定盛京通志》，卷 28。
② 刘远图：《早期中俄东段边界研究》，第 80 页。

中对界碑的绘示，只是清朝政府疆域观念的体现。[①] 对本文要讨论的问题而言，当时界碑存不存在并不十分重要，重要的是，正如承志所说，它体现了清朝政府的疆域观念。那么《黑龙江流域图》中对表示的边界位置的界碑的绘示，能够体现当时的边界位置，而该图标示的界碑旁的河流（即界河）就名为格尔必齐河。界碑、界河与《尼布楚条约》的吻合，更加证明了《黑龙江流域图》的可信性。

《龙沙纪略》是一部记载黑龙江地区较为详尽的地方志。作者方式济在约康熙五十二年随父流放齐齐哈尔，在谪居期间游历山川，考核古迹，写成《龙沙纪略》。从表 2 可以看到，《龙沙纪略》记载的大格尔必齐河是在界碑以西，与《吉林九河图》、《黑龙江流域图》相同。同时，它将界碑旁的河流记为小格尔必齐河，应是《吉林九河图》中的格尔必齐河，为区别于大格尔必齐河而加上“小”字。

以上三种资料都是经实地考察得出，《吉林九河图》和《黑龙江流域图》更是出于军事目的，由熟知黑龙江流域的人员编制，可以说是当时的军用地图，其对界河位置准确性的把握不言而喻。暂时撇开河流名称不谈，之后的各种文献中，所有界碑记录的文献对界碑位置的记载与《黑龙江流域图》是一致的（参见表 1、表 2）。这说明从尼布楚条约后到清末，政府对界河位置的理解从未产生混乱。那么何以后来大多数的舆图、文献对界河格尔必齐河的记载出现错乱，这值得思量。

按时间顺序，最早把界河标为大格尔必齐河的是康熙《皇舆全览图》。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雷孝思、杜德美、费隐等外国传教士受命测绘了黑龙江地区（黑龙江与宁古塔边界以西的上游地区）。负责测绘《皇舆全览图》的外国传教士固然掌握着先进的测绘技术，但对中国语言，尤其是格尔必齐河周边的少数民族语言，并不精通。所以他们很可能已经在这时把格尔必齐河和大格尔必齐河两个相近的名称混淆。对于河流名称而言，身为满洲人并且对当地十分熟悉的郎坦和萨布素的记载本应更为可信。但是由于《皇舆全览图》是中国清代首次全国范围内测绘制作的舆图，受到康熙帝的高度重视，加之其精度确实比此前的舆图要高，因此变成了清代舆图的权威，以后的诸多舆图、典籍不得不以它做参考。

通过表 1 的对比，我们可以发现，雍正《十排图》、乾隆《十三排图》和《皇舆全览图》对黑龙江流域的描绘惊人地相似。《雍正十排图》上没有绘制时间和作者，于福顺根据图中记载断定为雍正时期绘制。对于《十排图》的绘制，史书中几乎没有记载，更没有发现雍正年间有大规模实地测绘的迹象，因此《雍正十排图》作为全国范围的大地图，只能是大量地参考康熙《皇舆全览图》所作。之后的乾隆年间，由于平息了西藏、新疆的叛乱，得以在两地继续完成康熙年间未能完成的测绘，在《皇舆全览图》和新增测绘资料的基础上，编制成了《乾隆十三排图》。即，除了西藏、新疆两地有大规模的实地测绘外，其他地区，尤其是东北黑龙江流域，也是大量参考《皇舆全览图》而作。

成书于乾隆年间的《水道提纲》、最初两版《大清一统志》、嘉庆朝和光绪朝的《钦定大清会典图》等典籍的资料都不是来源于实地考察。《水道提纲》的作者齐召南，乾隆元年参与纂修《一统志》，直到乾隆八年（1745），因而有机会接触大量图书典籍，其中包括《康熙皇舆全览图》。乾隆十四年，齐召南辞官在老家养病。《水道提纲》就是齐这期间在天台老家著述的。《大清一统志》的编修自康熙二十五年（1685）设立一统志馆起，历雍正、乾隆三朝，期间几经周折，至乾隆八年，第一版《一统志》才告完成；乾隆二十九年，清朝平定新疆后，由于前志未能完备且多有错误，敕令重修一统志，乾隆五十四年新志告成；嘉庆十六年，因又发现前版一统志存在诸多错误，方略馆奏请修补前志，道光二十二年，第三版一统志告竣。三版一统志的主要

① 承志：《尼布楚条约界碑图的幻影 – 满文〈黑龙江流域图〉研究》，《故宫学术季刊》第 29 卷第 1 期（秋季号）。

史料来源是各地的通志、州府志、县志。正如康熙朝官员于成龙所言："皇上御极二十有二年癸亥，礼部奉旨檄催天下各省通志，限三月成书。命先取各省之志，以成一统之志，正欲于众中求其详，于翻中求其要。夫修志之役必始于县，县志成乃上之府，府荟集之为府志，府志成上之督抚，督抚荟集之为通志，通志归之礼部然后辑为《一统志》。"① 这则史料清楚而详细地表明了一统志与地方志书的关系，而且从侧面反映一统志关于格尔必齐河的记载也是有所参考，从它记载的内容上看，很明显是参考了《皇舆全览图》或类似的文献。

从表 2 可以看出，前两版《大清一统志》的记载几乎相同，并且界碑旁的河流标名大格尔必齐河；第三版《大清一统志》对前两版的记载没有作太大改动，但将界碑旁的河流名改回为格尔必齐河，将东边的河流名改回为大格尔必齐河。这也许是当时的编修者发现了界河名称标错的问题，并加以改正。但这个改正并没有影响以后的图典继续传抄《皇舆全览图》。

为编修一统志，康熙十一年清朝下令全国普修志书后，东北地区开始准备编修盛京通志，但由于府州县志进展缓慢，始终难以交差。在中央政府的催促下，康熙二十二年，由奉天府尹董秉忠利用各属新志，"数月阅而稿成"②。编纂进程如此迅速而仓促，其质量可想而知。此后，又经康熙五十年、雍正十一年、乾隆十三年和乾隆四十四年，多次大规模修订。最后一次大规模修订的成果，是乾隆四十九年竣工的《钦定盛京通志》。它对格尔必齐河的记载，已经在前面作了具体的分析，同样不值得信任。

《皇舆全览图》中的这个错误，不仅对稍后中国的地图产生影响，也直接影响了整个西方对黑龙江流域的认识。负责测绘的传教士每测完一省便将地图寄往法国，法国皇家首席地理学家唐维尔利用这些资料编成《中国新图册》在巴黎出版。1735 年杜赫德的《中华帝图和中国鞑靼地理、历史、编年史、政治与自然状况的概述》（简称《中华帝国志》）在巴黎出版，书中附有唐维尔编制的中国地图。可以说，西方人对中国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都来源于耶稣会士寄回欧洲的地图，并且在地图的传抄过程中又产生了错误。在《中华帝国志》第四卷所载地图的第九图上，界碑绘在额尔古纳河口上游的"安巴格尔必齐河"旁，这是完全仿造《皇舆全览图》的绘制，连碑的形制也与之相同。可是，在其下方额尔古纳河口下游的"阿济格格尔必齐河"旁又有标注："根据尼布楚条约，额尔古纳河和阿吉格格尔必齐河为莫斯科人和中国鞑靼人的边界"，并在河口的黑龙江上游标注："属莫斯科人"，下游标注："属中国鞑靼人"。③ 界碑和文字标注自相矛盾，但却很容易解释：界碑是完全照搬《皇舆全览图》画的，标注的文字是远在欧洲并没有踏足中国的唐维尔根据《尼布楚条约》的内容"格尔必齐河为两国之界"主观加上去的，因为《皇舆全览图》记载"格尔必齐河"的位置就在唐维尔图的"阿济格格尔必齐河"上。米勒的"移界说"所用地图资料，就是杜赫德书中所附的中国地图，他认为这幅图是尼布楚会议上的中方用图，而如上文所说，事实上它是参照尼布楚会议之后，康熙年间测绘的《皇舆全览图》的结果，对界河的位置记载比《皇舆全览图》更为混乱和不可靠。

结论

《吉林九河图》、《黑龙江流域图》和《龙沙纪略》是记载尼布楚条约界河格尔必齐河最原始的资料，通过实地考察，它们准确地记载了界河的位置。外国传教士负责绘制的《皇舆全览图》错误地把格尔必齐河标注在大格尔必齐河的东边，之后清代编纂的大量舆图、文献不加考辨地沿袭传抄，导致清代图籍对界河名称记载的混乱。而传教士寄回欧洲的拉丁文本《皇舆全

① 康熙《江南通志》，于成龙序。

② 康熙《盛京通志》，边声廷序。

③ 杜赫德：《中华帝国志》第四卷《中国新地图》，转引自刘远图：《早期中俄东段边界研究》，第 86 页。

览图》，经过唐维尔的主观修改，出现了矛盾的界碑和关于边界的注释，这无疑又为西方人理解正确的界河位置增加了一层迷雾。这些都成为误解界河格尔必齐河位置的资料基础。事实上，由于《皇舆全览图》及其后的雍正《十排图》、乾隆《十三排图》具有所谓的权威性，清朝官修舆图中标注界碑旁的河流名为大格尔必齐河的占大多数，如果不认真辨析资料的正误，界河是东边的格尔必齐河即今阿玛扎尔河的观点在资料上的确占优势。但是，只要对代表边界的界碑的相对位置有清晰概念，并且层层追溯资料的来源，辨别资料的可信度，也许《尼布楚条约》中界河格尔必齐河的位置就不会被误解。格尔必齐河相关记载的错乱，揭示了清代舆图文献编纂过程中沿袭传抄的弊病。由于清朝存在着大量的、系统的原始档案，只有追溯资料的原始来源，辨别原始资料的正误，并以此来核对清朝的官修舆图、政书、实录等，才会尽可能地还原历史真相。

主要参考文献

[1] 阿桂等：《钦定盛京通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87 年。

[2] 承志：《尼布楚条约界碑图的幻影－满文〈黑龙江流域图〉研究》，《故宫学术季刊》第 29 卷第 1 期（秋季号）。

[3] 方式济：《龙沙纪略》（龙江三纪本），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 年。

[4] 和珅等：《大清一统志》，乾隆四十九年。

[5] 蒋廷锡等：《大清一统志》，清内府抄本，乾隆八年。

[6] 刘远图：《早期中俄东段边界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年。

[7] 穆彰阿等：《大清一统志》，道光二十二年。

[8] 齐召南：《水道提纲》，光绪戊寅徐霞城精舍本。

[9]《钦定大清会典图》（嘉庆朝），台北：文海出版社，《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七十一辑，1966 年。

[10]《钦定大清会典图》（光绪朝），台北：文海出版社，《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七十一辑，1966 年。

[11] 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释文汇编·东北卷》，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8 年。

[12] 汪前进、刘若芳整理：《清廷三大实测全图集》，北京：外文出版社，2007 年。

[13] 薛虹：《彩绘满文黑龙江地图和格尔必齐河的位置》，《清史研究》1993 年第 4 期。

The Origin of the Dispute on Gorbitsa River's Location

YANG Liting, HOU Yangfang (Center for Historical Geographical Studies of Fudan University; 12110760001@fudan.edu.cn, yfhou@fudan.edu.cn)

There are two different views on the location of Gorbitsa River, which forms part of the boundary between China and Russia that was agreed to in the Treaty of Nerchinsk 1689. Chinese scholars generally believe that the Gorbitsa River (119 °10′E, 35 ° 08′N) was the old border, but some foreign scholars hold that today's Amazar river, which is east of the present-day Gorbitsa River, was the old Gorbitsa River. This paper sorts out these two views' and data biases and their original dates. It is noteworthy that although the records on Gorbitsa River were quite different, whether west or east of the great Gorbitsa River, the records on boundary tablets were the same. The tablet was always near the west river. It turns out that the boundary river agreed on in the Treaty of Nerchinsk was the western one, and this river was called Gorbitsa River in the Treaty of Nerchinsk. *Huang Yuquan Lantu*, which was drawn by foreign Jesuits, mistakenly marked the Gorbitsa River on east of the great Gorbitsa River. Yet, because of its authority, a large number of subsequent maps and literature, even Western literature about China, perpetuated this mistake. These erroneous maps and literature became the source of misunderstanding for the location of the Gorbitsa River. By the dispute of the Gorbitsa River's location, this paper reveals the shortcomings of private copying of Qing Dynasty maps and literature, and demonstrates that only by tracing back the original sources and identifying the original data, we can restore the fundamental historical truth.